

隔膜

冲突与趋同

清代的中西碰撞之争，饶有趣味，并且具有深厚的文化和政治内涵，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课题。这一课题迄今研究尚少，本书为这方面第一部专著，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WANGKAIXI

GEMO

CHONGTU

YU

QUTONG

王开玺

著

清代外交礼仪之争透析



隔膜、冲突与趋同

——清代外交礼仪之争透析

王开玺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隔膜、冲突与趋同:清代外交礼仪之争透析/王开玺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5
ISBN 7-303-05014-0

I. 隔… I. 王… III. 外交礼节-中国-清代
IV. D80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7753 号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出版人:常汝吉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4.75 字数:369千字

1999年5月第1版 199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20.00元

目 录

- 绪论 外交和外交礼仪** (1)
- 外交的定义/中国古代外交的萌动/西方国家的外交雏形和基本定型/传统外交和近代外交/西方国家的两种不同外交理念/外交礼仪概说/中国的重礼传统/外交礼仪与民族尊严、国家主权/中外传统外交礼仪的异同
- 第一章 国情隔膜与礼仪冲突** (34)
- 第一节 天朝大国与东方国家秩序** (36)
- 一 远古中国人的政治秩序观 (36)
- 二 现实制度与理想模式的背离与统一 (40)
- 三 明清天朝大国与东方国家秩序 (45)
- (一)宗藩制度形成的途径 (46)
- (二)中国皇帝的地位与职任 (49)
- (三)清王朝有关藩属国礼仪的规定 (56)
- 第二节 清政府与西欧早期来华外国使团的交往礼仪**
 (59)
- 一 明末清初葡萄牙、西班牙使臣来华的交往礼仪
 (60)
- 二 清朝初年荷兰使臣来华的交往礼仪 (63)

第三节 清朝初期中俄两国外交使团的交往礼仪	
.....	(71)
一 “从彼特林、巴伊科夫、阿勃林到米洛瓦诺夫使团来华	
.....	(71)
(一)俄使彼特林初次使华	(71)
(二)巴伊科夫使团来华	(72)
(三)阿勃林使团来华	(77)
(四)米洛瓦诺夫使团来华	(79)
二 尼果赖使团来华	(81)
(一)“只能受人迎接,而不能去迎接任何人”的俄国使臣	
.....	(81)
(二)破坏中国古制,另立新规的俄国使臣
.....	(86)
(三)故意违拗清廷礼仪规制的俄国使臣	... (90)
三 义杰斯使团来华 (96)
四 伊兹玛依洛夫使团来华 (103)
五 萨瓦使团来华 (108)
六 清廷使臣两次使俄 (113)
第四节 中英外交礼仪冲突的初起 (120)
一 马夏尔尼使团来华后的礼仪冲突 (120)
(一)远夷向化来朝 (122)
(二)礼仪的宽容与规矩 (126)
(三)柳暗花未明 (132)
(四)觐见前的礼仪之争 (136)
(五)众说纷纭的觐见礼 (140)
(六)幻觉与误会将继续 (148)

二 阿美士德使团来华后的礼仪之争	(153)
(一)英国外相训令的矛盾与嘉庆帝的警觉	(153)
(二)“三跪九叩”与“九跪一膝,九一俯首”	(158)
(三)不欢而散	(166)
三 律劳卑事件与中英礼仪之争	(171)
(一)是公司大班? 还是商务监督?	(171)
(二)席位座次之争	(176)
第二章 “平等”与“不平等”的外交礼仪之争	(195)
第一节 天朝大国不承认外夷“平等”	(195)
一 天朝中心论	(195)
二 中外官员书信文字的争论与确定	(201)
三 外国人是不是夷人	(204)
第二节 中外官员“平等”往来的交涉与确定	(210)
一 鸦片战争前中外官员“平等”往来的交涉	(210)
二 鸦片战争与中英两国官员交往方式的交涉和初步确定	(216)
三 中外官员“平等”交往礼仪的最终确定	(227)
第三节 咸丰朝外国公使驻京及其礼仪问题	(232)
一 外国公使驻京——西方国家追求已久的外交目标	(232)
二 英法的战争外交与清廷的婉拒	(236)
三 清廷君臣的分歧	(241)

四	咸丰帝的内定办法与英法的制造纠纷	(245)
五	平和？还是狡诈——美国公使与清廷外交礼仪 透视	(251)
六	以武力把公使送进北京	(258)
七	余波	(261)
第三章	在冲突中转型的外交礼仪	(275)
第一节	清国公使出洋——从屈辱中走向世界	(275)
一	清国无需遣使出洋？	(275)
二	从屈辱中走向世界	(282)
第二节	同治朝外国公使觐见清帝的礼仪争执与解决	(291)
一	拒绝觐见的堂皇理由——幼主临朝	(291)
二	清帝亲政 觐见之仪必行	(296)
三	咄咄逼人的日本大使	(305)
四	谁是胜利者？	(309)
第三节	同世界外交礼仪的对接	(315)
一	驻外使、领人员与西方国家外交礼仪的对接与 错位	(315)
二	驻外使、领人员服饰的变化	(322)
三	国书、国旗与国歌	(331)
四	国内待宾礼仪与西方国家外交礼仪的对接	(335)
第四节	循名责实的外交机构	(355)
一	理藩与礼部、理藩院	(355)
二	洋务与总理衙门	(359)
三	外交与外务部	(366)

第四章 趋同过程中的悖谬外交礼仪要求	(385)
第一节 载沣使德期间的礼仪纠葛与交涉	(385)
一 亲王使德 礼下于人	(385)
二 德皇为何坚持跪拜礼?	(389)
第二节 《辛丑条约》签订期间外国公使觐见清帝的礼仪之争	(392)
一 挟威泄忿 无理至极	(393)
二 礼有等差 预留地步	(394)
结束语——清代中外外交礼仪冲突评价	(404)
东西方国家应该如何共解时代给人类提出的外交课题/清代的礼仪之争与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历史轨迹/外交礼仪的趋同与中国的半殖民地化	
附录一	(421)
附录二	(457)

绪论 外交和外交礼仪

【外交的定义】外交一词,是我们经常接触和极为熟悉的。但什么是外交,却是很难简明扼要回答的问题。对此,各国的学者有着各不相同的理解和定义。

欧内斯特·萨道义认为:“外交是运用智慧和机敏去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

列·库达科夫认为:“外交是实现国家的对外政策的目的和利益的形式之一,它是国家借以执行对外政策的一种方法和手段。”

《苏联大百科全书》对外交的解释是:“外交是国家外交机构代表国家,以和平方式保护其在外国的权利和利益,为达到国家统治阶级的对外政策目标的活动。……在狭义上,外交是国家之间进行谈判或签订条约的艺术。”

《牛津英语词典》对外交的解释是:“外交是经过谈判来处理国际关系,并由大使和使节调整或处理这些关系的方法。”

《大英百科全书》对外交的解释是:“外交是主权国家通过可靠的机构,依国际法原则来处理、安排彼此之间的事务的必要的艺术与科学。”

我国《现代汉语词典》对外交的解释是:“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如参加国际组织和会议,跟别的国家互派使节、进行谈判、签订条约和协定等。”

尽管各国学者对外交的解释,带有各不相同的历史时代特点

和社会文化的特质,但其共同点是明显的。即外交是国家的代表或机构,为了本国近期或长远的利益需要,依据一定的制度、惯例、准则和礼节,以谈判或其他和平手段与他国进行对外交往的活动。

相互交往,是人类的普遍要求和习俗,据孟德斯鸠说:“甚至连吞食战俘的北美印第安易洛魁人……也派遣和接待使节。”⁽¹⁾一般说来,当一个民族或国家与另一个民族或国家接触时,实际上即已开始了最初的原始或传统的外交活动。然而,尽管外交是各个国家间进行交往的行为,但外交活动和行为并非与国家同时出现于人类社会。这是因为:世界各国的产生、形成与发展是极不平衡的。最初较早产生的国家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如高山峻岭、冰川荒漠、大海汪洋)、交通条件和通讯工具等的极度低下,彼此间还不可能很快即发生国家间的交往。

【中国古代外交的萌动】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以国家的形式出现大约是在公元前二千多年的夏朝。自此以后的夏、商、周各朝与周边的其它部落、方国、邦国、诸侯国,或各部落、方国、邦国、诸侯国之间虽已有了较为明显的交往关系,如郊劳(天子派官员至王畿边境迎接诸侯、藩国君主或使臣,互赠礼品)、赐舍(天子派官员将来宾迎入城内馆所休息,并设宴款待)、朝覲(在天子规定的日子,来宾覲见天子,呈献圭玉,行“再拜稽首”礼)、享献(覲见之后,来宾还要向天子呈献玉帛、马匹等)、赐车服饮食等(天子派人向来宾赠送优厚的车马、服装和酒食,以示礼尚往来。最后派人护送来宾离境回国)。但是,这种交往在理论上却是天子直接统治的千里京畿与间接统治下诸侯邦国间的交往关系,尚不具有较完整意义上的国家间的外交色彩。只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峙的各国间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外交活动。据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简编》粗略估计,春秋时期列国间大小战争约为484次,而朝会等和平来往,即早期的外交活动,约为450次,军事战争与外交折冲几各占一半。

政治方面和平往来的具体形式，主要有三：其一，某国君主亲自或遣使向另一国君主的聘问。如“公（鲁成公）如晋，朝嗣君也”；⁽²⁾“季文子（鲁季孙行父）初聘于齐”；⁽³⁾“宋公使华元来聘（来聘鲁成公）。……宋华元来聘，通嗣君也”；⁽⁴⁾“公（鲁昭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⁵⁾“晋侯使韩宣子（韩起）来聘（来聘鲁昭公），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⁶⁾等。其二，某国君主向另一国君主表示和平友善的修好。如“公（鲁隐公）会戎于潜，修惠公之好也。……戎请盟，秋盟于唐，复修戎好也”。⁽⁷⁾其三，与某事相关的各国，或处于霸主地位的某国君主召集其它有关国家君主结盟定约的盟会。如“蔡侯邓伯会于邓，始惧楚也”；⁽⁸⁾“公（鲁桓公）会杞侯于郕，杞求成也”；⁽⁹⁾“公（鲁桓公）会郑伯于曹”⁽¹⁰⁾等。

除政治方面的和平往来外，各国间尚有经济间的和平往来。如郑国与鲁国互易田土之事。据《左传》记载：郑伯曾向鲁隐公表示，希望以郑国的枋田易换鲁国的许田。后来鲁桓公即位，“修好于郑。郑人请复祀周公（祠），卒易枋田，公（鲁桓公）许之。三月，郑伯以璧假许田”。⁽¹¹⁾又如秦国向遭受天灾的晋国提供救济之事。晋国因天灾而发生饥荒，遂向秦国求救。秦伯询问大夫百里奚是否应给予救济。百里奚认为：“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¹²⁾力主给予必要的经济或物力援助。

另外，各国间尚有道义或精神等方面的礼仪往来，《左传》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如恤灾：“郑国有灾，晋君大夫不敢宁居”；“秋，宋大水，公（鲁庄公）使吊焉。”如吊唁：鲁襄公死后，“滕成公来会葬，情而多涕”等。

溯观中国上古史，我国的礼宾机构的出现大大早于外交机构（真正意义上的外交机构的设立，应是清廷于1861年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据《左传·正义》云：“周礼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大客之仪。小行人掌使适四方，协宾客之礼。诸侯行人当亦通掌此事，

故为通使之官。”由此可见，至迟在周朝时即已有了代表天子招待诸侯的“大行人”、“小行人”之官及其机构。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间的外交来往日趋增多，各国中类似今日来往于各国间的专职外交人员——行人，愈为普遍。《左传》昭公八年记载云：“楚人执陈行人于征师，杀之。”昭公二十三年记载云：“晋人执我行人叔孙婣。”襄公二十四年记载云：“郑行人公孙挥如晋聘”等。这种职司外交之职的行人，在以后的各朝各代中或许称谓不同，但却一直延续下来。例如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六月，明朝设置有行人司，设行人一，秩九品。左、右行人各一，从九品。未久，改行人司为司正，左、右行人为左、右司副，设行人多达345人。洪武二十七年，因原行人多为孝廉出身，奉使时难称朝命，遂设行人司官40名，皆以进士出身者任之。永乐年间，仍设行人司司正一人，品秩升为正七品；左、右司副各一人，从七品；行人37人，正八品，专司捧节奉使之事。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最突出而典型的外交活动，当数苏秦的“合纵”与张仪的“连横”，真可谓“折冲樽俎，纵横捭阖”。战国时期的世外高人鬼谷子先生曾培养出军事谋略之士孙臆与庞涓，孙臆胜于庞；外交舌辩之士苏秦与张仪，苏稍逊于张。

苏秦先张仪下山，首先以“合众弱以攻一强”，即相对弱小的齐、楚、燕、韩、赵、魏六国联成南北一条纵线，共同抗御西方强大秦国的“合纵”说，游说于赵萧侯，但是不得要领。其后，苏秦又转而游说于燕文侯，遂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此后，苏秦又相继说服了赵萧侯、韩宣王、魏襄王、齐宣王、楚威王，各国君王会盟于洹水，歃血盟誓，以苏秦为纵约长，佩六国相印。苏秦游说于东方六国，进行穿梭外交的目的，是谋求建立起六国联合抗秦的统一战线。其采用的外交方法、策略，或恫之以害，告以六国君王，若不能互结纵约以抗秦，六国必为秦国各个击破；或诱之以利，告以六国君王，如若结成纵约，甚至不待约成，只要他们能听从苏秦的谋略建议，各国即可不劳兵而获得诸如土地、财物等；或导之以情，每到一国，深刻分

析,甚至夸赞该国君王之贤明,地形之险要,武力之雄厚,财力之丰足等,以争取当权者的欢心并坚定其联约抗秦的信心。如苏秦第二次至并不强大的赵国,游说于赵萧侯时说:“当今之日,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赵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若韩、魏、齐、楚、燕、赵合纵为一,“剗白马而盟,要约曰:‘秦攻楚,齐、魏各出锐师以佐之,韩绝其粮道,赵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韩、魏,则楚绝其粮道,齐出锐师而佐之,赵涉河漳,燕守云中;秦攻齐,则楚绝其后,韩守城皋,魏塞其道,赵涉河漳、博关,燕出锐师以佐之;秦攻燕,则赵守常山,楚军武关,齐涉渤海,韩、魏皆出锐师以佐之。秦攻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清河,燕出锐师以佐之。’六国纵约为一,‘秦必破矣’,赵王即可成其霸业。由此我们可见赵萧侯为什么会决定“寡人敬以国从”,送苏秦以车百乘,黄金千镒,白璧百只,锦绣千纯(疋),“以约诸侯”。⁽¹³⁾

苏秦建立六国抗秦统一战线的外交努力,一度使战国时期秦国与六国的战略形势为之一变。《战国策》曾这样高度评价苏秦的外交成就:“苏秦……为武安君,受相印……约纵散横,以抑强秦。……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于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¹⁴⁾《史记》也说:纵约六国,“乃投纵约于秦,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¹⁵⁾

张仪后苏秦而至各国。此时合纵之说已为各国君主所重,故张仪屡屡不见用于各国。无奈,张仪恃同学之谊,去赵国求见地位显赫的苏秦。苏秦先是闭门不见,后又以“以子之才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讥之。张仪以受辱之故,西入秦国,颇受秦王信任,为秦相。张仪首先助秦西灭义渠戎,南灭蜀,进一步扩大了疆土,增强了军事实力。秦国的日益强大,使东方诸国皆十分惊惧。张仪趁此机会,赴“纵约”各国进行旨在离间六国

“合纵”关系的外交游说。其每到一国，或威胁，或利诱，力劝该国君主“事一强而攻众弱”，即西事强秦，与秦国连成一条横线，这样，不但可以避免秦国的进攻，而且可凭借秦国的强大势力称雄于其它国家，做一个第二强国。从张仪游说魏王的外交词令可见其一斑：“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地四平”，国力不强，若不事秦，乃“四分五裂之道也”。“为大王计，莫如事秦。事秦则楚、韩不敢动；无楚、韩之患，则大王高枕无忧矣。”其游说韩王时也是以“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菽即麦……一岁不收，民不厌糟糠，地不过九百里，无二岁之食，料大王之卒不过三十万”，“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据宜阳……则王之国分矣”之词相警示，迫使韩王在“先事秦则安，不事秦则危”⁽¹⁶⁾二者之间进行利害关系的抉择。

张仪的这一系列“连横”外交活动，亦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先后分别说服了魏国、楚国、韩国、齐国、赵国、燕国。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成功地离间了齐国与楚国的合纵之约。当时，东方六国中较为强大的齐国与楚国结盟共抗秦国。张仪以秦国愿献土地六百里及美女，劝诱楚怀王绝齐而从秦。楚怀王贪秦国之利，遂与齐国绝交。但当楚国派人向秦国索要六百里土地时，秦国却说当初只许以六里土地。楚怀王大怒，于公元前 312 年发大兵攻秦。两军大战于丹阳（河南丹水北岸），楚兵大败，秦国进而夺取了楚国的汉中地区。楚怀王复倾全国之兵攻秦，旋又在陕西的蓝田大败，从此，楚国势力大为削弱。

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外交，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疆域范围内各割据政权间的外交行为，尚非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外交活动。中国古代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国家间的大规模外交活动，当属西汉时期的张骞出使西域各国和明朝的郑和七次下西洋。

西汉武帝为联合西域的大月氏等国家，从东西两方面夹击匈奴，于建元三年（公元前 138 年）派张骞率百余人的使团自陇西西行，西出葱岭，经大宛（乌兹别克共和国东部，其都城贵山即今之霍

占)、康居(今哈萨克共和国咸海沿岸锡尔河一带),最后到达大夏(今阿富汗北部)。此时的大月氏人因当地自然环境很好,无意对匈奴人复仇,张骞没有完成既定的外交使命。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为联络西域的乌孙各国共同对匈奴作战,第二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率领一支三百人的大规模使团,每人备有两匹良马,携带有大量牛羊、金币、丝帛等。张骞到达乌孙后,力劝乌孙王昆莫重返河西走廊一带的故土。昆莫未允。张骞虽仍未完成此次的外交使命,但却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偕同乌孙使者数十人返回西汉都城长安。不久,张骞自乌孙派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等国的持节副使,也偕同这些国家报聘汉朝的使者陆续回到长安。

二千年前,张骞等人不畏山高路险,行程数千里,两次出使西域各国,虽未达到其出使的直接外交目的,但却不愧为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外交壮举。“此后,汉使西行的,每年多则十余次,少则五六次,每次有百余人到数百人。”⁽¹⁷⁾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张骞等人两次出使西域各国,不但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地理知识,进一步加强了西汉皇朝同西域各民族和国家间的政治联系,而且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胡麻、胡瓜、胡蒜、胡桃等植物,陆续向东移植;西域的良马、橐驼、各种奇禽异兽以及名贵的毛织品,也源源东来。佛教和佛教艺术也经中亚传到西域,稍后再向东土传播,对中国文化发生了很大影响。中原地区则向西域输送大量的丝织品和金属工具,并把铸铁、凿井(包括井渠)等技术传到西域。”⁽¹⁸⁾由此可见,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取得了极其重大的外交成果。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西汉时期苏武持节之事。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中郎将苏武受汉武帝派遣出使匈奴。苏武到达匈奴后,遭到扣留。匈奴人为迫使其归降,断绝食品供给。苏武虽掘野鼠而食,也断不肯叛汉而降服匈奴。他手持汉节(即装饰有牦牛尾的

杖)，在异国他乡的荒凉之地牧羊十九年。后来，其所持汉节上的牦牛尾毛虽皆已脱落，但苏武始终不肯丢弃节杖。我们现在经常讲的“气节”，即是由此引申而来。出使他国的外交人员之所以称作外交使节，也是由此引申而来，意思是说出使人员是受国家首脑任命并颁授以凭信的外交人员，只不过现今的外交凭信是国书，而不是古代的“节杖”了。

大约一千五百年后明王朝派遣郑和七次下西洋，“视汉之张骞、常惠等凿空西域，尤为险远”。⁽¹⁹⁾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同时也是世界古代历史上的一次最伟大的外交壮举。

经过四年的“靖难之役”，明成祖朱棣即位。自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明统治者先后七次派遣郑和远航西洋各国，进行类似于周游列国式的外交活动。郑和此行，奉有多项外交使命。其一，广泛招徕海外的朝贡使节，宣扬明王朝统御天下的德威。明成祖即位后不久即向海外宣称：“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²⁰⁾希望尽快形成“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仰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朝仁圣。天阶朝列众公卿，齐声歌太平”，⁽²¹⁾天命所归，万方来朝的盛世局面。为此，郑和西行各国时，恩威并施。正如他本人所说：“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奉琛执贄，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船百艘，赍币往贄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及临外邦，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掠者，剿灭之。”⁽²²⁾其二，寻访建文帝下落，消灭建文帝的残余势力。身为燕王的朱棣通过所谓的“靖难之役”，虽攻陷了南京，“入继大统”，但建文帝的生死下落始终不明，“成祖疑惠帝亡海外”，⁽²³⁾担心建文帝联络海外诸国东山再起，故派郑和出洋“访建文踪迹”。⁽²⁴⁾为此，郑和对流亡海外的中国流民竭力招抚。对那些拒绝招抚的流民则予以镇压，以绝后患。其三，进一步加强中央专制集权，将其皇权势力伸展到经济领域中来，利用国家的力量垄断自宋元以来日渐发达的海外贸易，换取皇

室所珍视的海外奢侈品。

郑和所率船队，有船一二百艘，其中大、中型船只六七十艘，随行各类人员大约二万七八千人；其中最大的宝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可载一千余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其它船只亦可容载四五百人。这支船队自苏州的刘家港出发，先后到达过占城（越南）、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满拉加、吉兰亭、彭亨（马来西亚）、苏门答腊、旧港、爪哇、阿鲁、南渤里（印度尼西亚）、锡兰山、溜山（斯里兰卡）、榜葛拉、琐里、柯枝、古里（印度）、忽鲁谟斯（伊朗）、阿丹（也门民主共和国）、卜刺哇、竹步、木骨都束（索马里）、麻林（肯尼亚）等地区和国家。“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余万里”。⁽²⁵⁾

郑和七次大规模下西洋，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和世界古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政府外交活动。他既与亚非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进行直接的经济、政治、外交接触，同时又为以后的中外进一步交往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郑和七下西洋后，亚非各国的使节纷纷来华，带来了珍珠宝石、玛瑙翡翠等奇珍异宝以及孔雀、鸵鸟、狮子、花福鹿（即斑马）、麒麟（即长颈鹿）等动物。中国的丝织品、瓷器、漆器等也传运至西方各国。

【西方国家的外交雏形和基本定型】外交活动的出现，在西方也是较早的。早在古希腊时，许多自治城邦即开始了通过使臣、信使或其它使者建立联系的外交活动。当时，一般是由各城邦的国民大会或长老，派出那些出色的辩论家、演说家作为临时的特命使节，赴其它城邦国家进行外交活动。他们大多携有本城邦国颁给的证书（大约相当今日的国书），说明其出使的主要目的。当其完成任务返回本城邦后，需向本城邦国民大会报告有关出使情况，随后便被解除这一职务。在大约公元前500~400年时，他们还建立了用于接待外国使者的官办宾馆——“外国人驿馆”。“外交”源于“证书”一词。该词的希腊文为“Diploma”，意思是“一折为二”，系